

试论高校日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正迁移现象

任 萍

摘 要：母语文化是学习第二种语言的基础，以母语为汉语的人们学习日语为例，探讨汉语转化为学习日语的积极因素的可能性，预测和描述汉语在日语学习中的正迁移现象，对日语教学和日语学习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日语教学中的汉语正迁移现象表现在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等各个方面，而语音、词汇、语法也是日语专业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因此可以以母语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对古汉语与现代日语在语音、词义、语法等方面的关系的说明，一方面导入母语文化知识，一方面帮助学生加深对日语的记忆与理解。

关键词：日语教学；母语文化；正迁移

作者简介：任萍，女，副教授，博士。（浙江树人大学 语言学院，浙江 杭州，310015）

中图分类号：H360.9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3-0113-04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母语知识对外语习得的影响是语言学家及心理学家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必然会受到母语的影响。这种影响称为二语习得中的母语迁移现象。根据语言迁移理论，语言迁移有负迁移也有正迁移，人们往往更多地提及负迁移，而忽略了正迁移。母语文化是学习第二种语言的基础，以母语为汉语的人们学习日语为例，探讨汉语转化为学习日语的积极因素的可能性，预测和描述汉语在日语学习中的正迁移现象，对日语教学和日语学习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高校日语教学中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母语文化失语现象，主要表现在教学大纲中对导入母语文化的要求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中母语文化课程的设置不受关注，日语教材中母语文化内容所占比例偏少等。因此，要在日语教学中导入母语文化，除了制定科学的培养方案与合理的课程体系，提高母语文化在日语教材中的比例外，更重要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导入母语文化，重视语言的正迁移现象。^[1]

日语教学中的汉语正迁移现象表现在语音、词汇、语义和语法等各个方面，而语音、词汇、语法也是日语专业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因此可以以母语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对古汉语与现代日语在语音、词义、语法等方面的关系的说明，一方面导入母语文化知识，一方面帮助学生加深对日语的记忆与理解。

一、古汉语对现代日语语音的影响

日语汉字的发音分为音读和训读。音读是古代日本人模仿汉字的读音，按照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时的读音来发音，是接近中国汉字原音的日语化读音。由于汉字或汉语词汇传入日本的时期、途径不同以及汉字原音在中国的地区性差异等原因，日本的汉字往往有几个音读形式。日语汉字的音读读音基本可以分为吴音、汉音、唐宋音和惯用音。据统计，在《常用汉字表》中列出的音读汉字共有2187个读音，其中吴音467个，汉音935个，二者都有的577个，其余的是唐宋音或惯用音。^[2]

日语汉字音读的产生与汉语原音有直接关系，搞清日语吴音、汉音等读音与汉语拼音的关系，对我们正确掌握日语汉字读音会起到重要作用。关于日语汉字音读，我国学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成果颇多。其中200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成春有的《日语汉字音读研究》在参考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比较语言学和音韵学的知识，对日语汉字音读和现代汉语拼音的对应关系作了较为全面的、系统的对比分析，对于日语教学有很大参考意义。笔者认为可以在日语教学中从以下几方面说明古汉语对现代日语语音的影响，从而帮助学习者正确判断日语汉字的音读。

首先，了解日语汉字音读中吴音、汉音、唐宋音传入日本的时期，掌握不同音读汉字的主要适用范围。在

隋唐以前的长江中下游吴楚地方,中国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宋、齐、梁、陈五朝相继定都建康(今南京市),成为东晋南朝的政治中心,因此源于中原、成长于江南的中古江陵语音成为当时的标准音。南朝灭亡以后,隋唐兴起,都城迁往长安,洛阳成为陪都,于是标准音又回到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音系。可见,不同时期我国政治文化中心所处的区域不同,因此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也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与地域痕迹,即隋唐以前以中古江陵语音为主,隋唐以后则以中原音系为主。由于不同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不尽相同,因此传入日本的汉字在不同的领域也以不同的音读为主。

根据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日汉大辞典》记载,吴音是古代中国吴越地方传到日本的汉字读音。传入日本的途径有二,一是经过朝鲜传入日本;二是中国六朝时代的佛教僧侣所传,主要用于诵读佛经与庶民交往,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统治阶级利用以僧侣为中心的教团组织大力推行宗教信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日语读音的快速定形。因此在现代日语中,佛教用语仍基本沿用吴音的读音,比如“修行(しゅぎょう)”“经文(きょうもん)”“极乐(ごくらく)”等。日本现存最早的典籍《古事记》全书用汉字写成,音、训交互使用,其中多为吴音,明显受到汉译佛经的影响,而语言风格与用词也与六朝口语极为相近。^[3]此外,日本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也都是以吴音标注的。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政府往来密切,奈良末期、平安朝初期的遣唐使大多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短期的请益生、还学生和长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更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4][202]}他们将儒家经典以及各种文化典籍带回日本,并将当时长安地区的发音传入日本。为了和以前的发音相区别,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被称为汉音。汉音传入日本后,得到日本朝廷自上而下的推行,很快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平安时代的标准音。公元798年,朝廷下令“用汉音,读五经,明经之徒从之读十三经也。如诗文杂书,吴汉杂用。佛书仍旧以吴音读焉。”^[5]可见,汉音传入日本后,儒教等经典多用汉音;诗文杂书等则吴音、汉音兼用;而佛经等仍用吴音。因此现代日语中的大部分日语汉字都沿用汉音发音,比如“孝行(こうこう)”“论语(ろんご)”“文人(ぶんじん)”等。此外,这一时期的日本官修史书《日本书纪》也多用汉音标注。

中国的宋、元、明时期相当于日本的镰仓至室町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日间的禅文化交流以及勘合贸易的盛行,禅僧以及商人将中国江南地区的汉字发音传入日本。按照传入时期来说,此时传入日本的汉字读音应该称为宋元音,但由于之前的唐朝文明空前繁

荣,虽然已经改朝换代,但仍被称为唐宋音。之前吴音的传入以及日本朝廷对汉音的推广,使日本汉字音读体系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备,因此唐宋音传入日本后较少使用,主要用于禅宗的清规以及当时传入日本的食物、器物等的读音,比如“径山(きんざん)”“喫茶(きっさ)”“行脚(あんぎゃ)”等。

其次,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古汉语发音特点,对比汉语各区域方言的发音,学习日语汉字的音读。我国学者应骥(1997年)指出,探求日语汉字音读的奥秘,与其说通晓一些音韵知识倒不如说先掌握一些中古音汉语读音或者是懂些方言土语尤其是南方方言更为重要。^[6]从上述吴音、汉音、唐宋音传入日本的途径来看,吴音源于中原、成长于江南的中古江陵语音;汉音源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音系;唐宋音则以南宋都城杭州方言为基础。

从现代日语汉字的发音来看,其中很多与我国江浙、广东等地的方言极为相近。黄建香(2001)结合吴方言和古日语,对双方的形容词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详细考察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形容词,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吴方言对日语的巨大渗透作用。例如,古日语中赋予形容词普遍特性的“し”的词源极有可能来自吴语的形容词词尾“希”,“よろし”的“ろし”虽然只代表了少数形容词的特征,但近似吴语“来希”的用法,因此可以推测“希”“来西”等在古代吴语中就是非常普遍的形容词词尾。^[7]谢育新(2004)以韵母为中心,对日语汉字音读汉音与客家话韵母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调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韵母“ia”“ua”“e”“ei”“u”“i”的发音,与现代汉语的标准音相比,客家话的发音更接近日语发音。因此推测这很可能是因为客家话与日语都保留了汉字的中古音韵。^[8]

由于隋唐以前的吴楚音与隋唐时期的中原音的发音有所不同,使得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汉字的读音也形成了相应的区别,即日语吴音与汉音的差异。例如,吴楚音存在明显浊音,中原音的浊音则不明显。反映在日语读音中,则表现为吴音中多有浊音,而与之相对应的汉音则多为清音。关于日语吴音与汉音的差别,李月松(1996年)、李福生(2001年)、栗霞(2008年)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正如成春有所说:“搞清日语吴音汉音与汉语拼音的关系,对我们正确掌握日语汉字读音会起到重要作用。”^[9]

二、古汉语对现代日语词形词义的影响

日语词汇按照构成方式可以分为“和语”“汉语”“外来语”及“混合语”,其中“和语”与“汉语”词汇占主导地位。根据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90种现代杂志用语用字调查统计,“汉语”词汇在四类词汇中所占比率为47.5%,超过了另外三种词类各占的比率。由此

可见“汉语”词汇在日语中所处的重要地位。^[10]汉字和汉语词汇无论是在深度或是在广度上都积极参与了日语的形成和发展,对日语乃至日本文化具有再塑造作用。不仅如此,汉字、汉语词汇已经成为现代日语构词、造词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首先,现代日语中的大部分汉字词汇是古日语沿用古汉语的词汇,这是形成中日文存在大量同形词的主要原因。在长达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汉语与日语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同形词,极大丰富了两国的语言,促进了两国人民在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流。这部分词汇发展至今,根据其意义区别可以分为同义词、类义词、异义词。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制定的《日语教育基本词汇2000词》中共有594个同形词,其中同义词355个(59.76%),类义词189个(31.82%),异义词50个(8.42%)。^[11]从这一数据可知,中日文的同形词中约有60%是同义词。这是由于在汉字传入日本的同时,大量汉字词汇相继传入日本,并且意义也被沿用。而另一方面,由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加上中日两国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系统不同,一部分中日同形词在词义以及功能上都呈现出种种差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古今汉语词义的不同造成中日文同形词意义不同的主要原因。古汉语中的许多词汇发展至今,词义上普遍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有些词除在一定场合仍然使用外,现代汉语一般不再使用;有些词虽然仍然使用,但词义却发展演变,与原词的意义大相径庭。

例如“料”在现代汉语中作名词使用时是指“可供制造其他东西的物质”,如“材料”、“备料”等。在日语中是“款项”、“费用”的意思,因此含有“料”的词语多表示“钱财、费用”,如“給料”是“工资”,“手数料”是“手续费”,“授業料”是“学费”等。其实,在我国古代的隋朝及唐宋时期,官吏在俸禄外所获津贴的食料、口粮也称为“料”。如唐宋时期,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为“料钱”。白居易《送陕州王司马建赴任》中有“公事忙闲同少尹,料钱多少敌尚书。”可见,古汉语中“料”有钱财之义,然而这一意义在汉语中并未得到沿用,而是随着唐宋官员俸料制度的消失而终结,因此现代汉语中的“料”已非古汉语中的“料”,但是古汉语中“料”的意义却在日语中被沿用了下来。

其次,现代日语的汉字词汇有一部分来自明治时期翻译外国资料时选用的古汉语词汇,这些词汇在日本定型后又传入中国,也是形成中日文存在大量同形词的原因之一。据统计,《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收录的源自日语的单词有893个。^[12]众所周知,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时代译介西学的启蒙学者,如井上哲次郎、福泽谕吉、西周等人,都具有深厚的汉学素养,他们在翻译西学术语时,借用中国的古典词汇,注入新含义,与西学的相

关术语相对应。例如,经济、社会、伦理等等。这些词语虽然在古汉语中也有,但意义却和现代日语的意义有所不同。因此关于这些词语是否算是日语沿袭古汉语的词语,还是日语中的新创词语,学界存在不同意见。但不可否认,日语中的这些汉字词汇的确受到了古汉语的影响。

再次,古汉语中的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是形成中日文存在大量异体词的主要原因。日语中有相当数量的汉字复音词(日语称为“熟语”),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汉字词形,可以称为异体词。日语异体词中相异词素的用字情况,相当于古汉语中的通假字、异体字或古今字等。古汉语通假字是指古汉语书面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的通用和假借。这个读音指的是古汉语的语音,而非现代汉语的语音。由于日语中的各类音读系统与古汉语的读音系统相一致,因此古音相同的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也基本相同。^[13]这一点是日语汉字词能直接使用古汉语通假字的主要条件,也是造成中日汉语词汇异形同义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日语中的“工夫(くふう)”汉语为“功夫”,《新明解国语辞典》中在这一词条下标识说“也写作‘功夫’”,而《大辞林》在这一词条中则将“工夫?功夫”的汉字都写了出来。《王力古汉语字典》中有“‘工’通‘功’”,即二者在古汉语中是通假字。又如日语中的“知恵(ちえ)”汉语为“智慧”,《新明解国语辞典》中在这一词条下明确标识说“原本汉字写作‘智慧’”。古汉语中“惠”与“慧”是通假字,“知”与“智”是古今字。

所谓古今字指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字来表示,早期或者先使用的字是古字,后来使用的字是今字。许多汉语复音词的古字词和今字词产生的时间都早在中古以前,古汉语传入日本时,这些古今字词也相继传入日本,因此日语中古汉语原有的古今字异体词非常多。例如,上文词例中的“知”与“智”就是古今字。《释名·释言语》中有“智,知也。”《淮南子·道应》中有“知可否者,智也。”可见,在古汉语中最初用“知”字表示智慧,后来也用“智”字。古汉语传入日本后,日语汉字选择了“知”字,而现代汉语却选择了“智”字。又如,日语中的“希少(きしょう)”现代汉语中为“稀少”,“希”与“稀”在古汉语中也是古今字。

此外,古汉语中的异体字也是造成中日文存在大量异体词的原因之一。异体字指的是读音和意义完全相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相替代的字。日语中互为异体字的异体词素都是从古汉语兼收并蓄而来的。例如,日语中的“疎通(そつう)”汉语为“通”,《新明解国语辞典》中在这一词条下标识说“也写作‘疏通’”,而《大辞林》中在这一词条中则将“疎通·疏通”都写了

出来。《王力古汉语字典》中解释说“疎”为“疏”的俗字,也就是说“疎”是“疏”的异体字。又如,“愛玩(あいがん)”的汉字也可以写成“愛翫”。《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将“玩”与“翫”列为同源字,即二者是异体字。

三、古汉语对现代日语语法结构的影响

汉文最早传入日本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公元五世纪左右,当时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百济频繁向日本遣使传授大陆文化,以换取军事援助。^{[4][141]}日本的汉学研究也大致开始于这一时期,在漫长的汉学研究历史中,日本汉学家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翻译、解读中国古代作品的方法,人们称之为“训读”。日语训读中的“训”来自于汉语“训诂”一词,指诠释、说明词语的词义和用法。“训读”是指以日语注释说明汉语词的含义等,使读者了解汉语词义,能够阅读作品原文。由于汉语文献的影响,大量的汉语语法现象融入日语,这些语法现象使日语的古典文献呈现为“汉文调”与“和文调”两种方式。一些受汉语语法影响形成的日语语法现象已经被古代日本人接受,并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得到发展。

首先,日语形容词的词序、基本语法功能与汉语基本一致。这是因为古人在进行训读式汉日翻译时,以汉语词性的基本内涵为标准来寻找相应的日语。例如,“因此有化生之神,号可美弋彦舅尊(中略)可美、此云于麻时。”(《日本书纪·神代卷上》)即“可美”训读为“于麻时”(うまし)。在汉籍中,“可美”有如下使用。“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可美也。”(《淮南子·泰族训》)《说文》中有:“美,甘也。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无鄙切注,臣铉等曰: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美”在古汉语中的基本词性是形容词,指美味,美好。而翻译成日语时,保留了“美”的形容词词性和功能,用来修饰名词。这也可以从《万叶集》中的和歌得到证明,如“美丽物”(うまし物)。“于麻时”(うまし)在现代日语中以“うまい”的形态被广泛使用,如“うまい酒”(美酒)、“うまいこと”(好事)等。

其次,日语中的判断句、被动句等许多句式基本沿用古汉语的相应句式。平安初期,随着大量汉译佛教经典传入日本,阅读和理解这些汉译佛经成为各大寺院学僧的主要任务。于是,奈良各大寺院的学僧们创造了在汉字周围加注符号即“训点”的方法。我国学者杨金萍(2004)以日本龙光院藏《妙法莲华经》为例,分析了古代汉语语法中“是”“有”以及定语后置等语法现象对日语训读语法形成的影响。^[14]古汉语中往往用名词性

结构或形容词性结构充当谓语,与“也”结合构成名词谓语句或形容词谓语句,其典型表现是“~者~也”句式或“~也”句式。相同意义的句子在古日语中用“なり”表示,相当于现代日语中的“~は~である”。例如,《庄子·齐物论》中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日语训读为“昔者に莊周、夢に蝴蝶と為りて、栩栩然たる蝴蝶なり。”可见古汉语语法在日语训读语法形成过程中曾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日语的表现形式。

综上所述,古汉语和日语在语音、词义、语法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共通性和可比性,这些都给中国人学习日语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采用“趋同法”去记忆日语的语音、词汇与语法。通过在日语教学中导入母语文化,对古汉语与日语进行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日语的规律,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而且对于提升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水平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任萍. 高校日语教学中的本土文化失语现象[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0(3):81-84.
- [2] 王保田. 关于汉语的韵母与日语汉字读音[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3):34.
- [3] 冯良珍. 古代汉语和古代日语的交融——《古事记》的语言特色[J]. 中国语言学报,(7).
- [4] 王勇. 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202.
- [5] 栗霞. 日语汉字音读中的吴音与汉音[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2.
- [6] 应骥. 试析日语汉字音读及其汉语读音[J]. 日语学习与研究,1997(1):33.
- [7] 黄建香. 试探吴方言对古日语的影响[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106.
- [8] 谢育新. 日语汉字音读与客家话对应关系初探——以日语汉音和韵母为中心[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增刊):33.
- [9] 成春有,游衣明. 日语吴音汉音子音差异比较研究[J]. 外语研究,2004(3):30.
- [10] 毛峰林. 中日同形词教学研究[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4):46.
- [11] 黄莺. 日语汉字词汇教育——以中日同形词为主要研究对象[J]. 宁波大学学报,2006(1):84.
- [12] 王晓. 关于日语教学中的中日同形词[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增刊):38.
- [13] 春复. 日语汉字词同词异体的古汉语用字关系[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2):70.
- [14] 杨金萍,肖平. 论古代汉语在日语训读语法形成过程中的影响——以“是”“有”和定语后置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41-43.